

战后马来亚华人政治浅析

廖小健

华人社会由流动转为稳定、民族关系日益复杂、华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以及国际环境的剧变，等等，使马来亚华人政治由战前的外向封闭型转为战后的内向开放型，从关心母国，局限本族到联合各族参与当地政治。华人参政加速了马来亚的独立进程，也改善了本身的政治地位，为华人在马来亚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前提。从此，华人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活跃在马来亚政坛上。

马来亚华人与当地马来人数目相当，是构成马来亚人口三大种族之一，它的政治活动对马来亚社会政治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马来亚独立期间的马来亚华人政治斗争作简要论述，并就其发展的前因后果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中马早有交往，但直到英国殖民者侵占马来亚后，本世纪初由于急剧发展锡业、橡胶业需要大量劳工，华人才大规模地移入马来亚。到1931年，华人已达170万人，占全马人口（约434万）三分之一强。^①然而，华人社会的政治活动却基本和马来亚本土没有联系。

本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社会曾是中国维新志士和革命者的活动基地和避难所。同盟会在新加坡等地建立支部后，马来亚华人更是大规模地从人力物力上支持国内的历次起义和辛亥革命。1912年后，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各地建立支部，1925年被取缔，五年后才恢复合法地位。国民党在马的活动主要是扩大组织、筹募经费和建立华校等等。中国共产党原来与马来亚国民党支部共同活动，国共分裂后，共产党独立建南洋共产党。1931年正式建立马来亚共产党，以华人为主，主要在华人社会中活动，曾组织过多次罢工斗争。中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及其组织都积极进行抗日宣传，筹款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因此，战前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政治活动主要与母国相呼应，具有外向型的特点，而且局限于华人社会，又具有封闭型的性质，这些特性到战后才发生质的变化。

（一）华人社会这个转折的首要标志是以华人为主体的马来亚共产党登上了马来亚政治舞台。

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坚持抗日和拥有武装，战后初年马来亚共产党的威信和力量达到了顶峰，并在日本投降后英军开抵马来亚前控制了全国。虽然它没有建立独立政权，但它对马来亚政治始终起着重要的影响。在政策上，马来亚共产党于1945年9月就提出通过普选建立全马人民代表会议，争取马来亚独立的纲领，并不断揭露英国当局各种政策的殖民实质，号召建立各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反帝斗争。在组织上，战争一结束，马来亚共产党就

着手恢复和建立各种民主组织，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军人协会、泛马总工会等等，为开展反殖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此后，马来亚共产党还把影响扩大到马来亚民主同盟、马来亚民族党及后来的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中去。在行动上，马共主要以发动各种罢工、示威来与殖民政府作斗争。例如，1946年1月底举行全马大罢工，抗议殖民当局非法逮捕和审判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士。不久，马来亚共产党宣布1946年2月15日为“国耻纪念日”，开展各种示威活动，揭露殖民当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卖马来亚的卑鄙行径。其他不同规模的罢工一直连绵不断。

显然，马共不仅仅是一个引导华人积极参加马来亚政治斗争的政治组织，而且是作为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坚力量活跃在马来亚政治舞台上，其活动的影响和意义已远远超出华人社会的范围。在民主独立成为战后殖民地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情况下，马来人左翼组织马来亚民族党虽然也提出争取独立的政治要求，但毕竟追随者不多，影响有限。非马来人激进组织马来亚民主同盟同样只有少数拥护者，而且政治纲领很不彻底，其目标仅仅是实现在英联邦内的自治。巫人全国统一组织虽然得到大部分马来人的支持，但政治上更软弱，根本不反殖民主义。只有马共的群众基础最雄厚，鲜明地高举反殖的旗帜，指明并代表了马来亚独立的发展方向。在“紧急状态”之后，它又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严重打击了殖民统治，促进了独立运动的发展。在马来亚华人政治史上，而且在马来亚民族独立史上，马共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忽视，也不能回避的。

(二) 在战后马来亚华人政治变迁中，以华人为主力的三次抗议马来亚联邦宪法统一战线的形成，则充分显示了华人的政治潜力。

殖民当局1946年初宣布的马来亚联邦计划，因触犯马来人的利益而遭到马来人的强烈反对。尔后，殖民者秘密和马来人协商，以严格限制非马来人公民权的条件换取马来人对加强殖民统治的让步，抛出了联邦宪法草案。殖民当局为所欲为地利用非马来人公民权利作为与马来人讨价还价的筹码，终于激起了普遍的愤慨。同年底，马来亚民主同盟等八个组织建成第一次统一战线——联合行动委员会。不久，组织扩大，改名为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次年初，它与马来人的马来亚人民联合阵线组成第二次统一战线。1947年7月，当局正式公布联邦宪法草案后，华人商会也与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及马来亚人民联合阵线统一行动，三方建成第三次统一战线。这三次统一战线皆以反对联邦宪法草案为宗旨，提出关于自治和平等公民权的主张，并以示威、停业等行动作抵制。

在这几次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华人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几次统一战线建立的主要导火索，是殖民当局在联邦宪法草案中对非马来人公民权的严格规定，要求平等公民权便成为统一战线的主要主张之一，而华人是马来亚人数最多的非马来人，对非马来人平等公民权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的切身利益。第二，华人一直是统一战线的主力。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超过50万，绝大部分是华人，并以华商陈祯禄为主席。后来参加统一战线的华人商会，其华人性质更是不容置疑了。第三，统一战线最实际的抵制活动也是以华人为主体发动的。如，华人商会属下的各业华商于1947年9月在雪兰莪、马六甲及霹靂等地发动，继而到10月20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停业活动；大部分新加坡华人拒绝参加1948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立法会议选举，等等。^②

统一战线的斗争虽然没有迫使当局改变主意，但它充分说明华人的觉醒，及其对马来

亚政治的日益关注，为后来华人政党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三) 马华公会作为一个政党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对马来亚政治生活施以强大影响，是战后马来亚华人政治由外向封闭性转为内向开放性的主要标志。

马华公会的初期活动主要是支持政府的反共战争，主张马华民族协调，并力争华人的平等公民权等等。它作为一个政党真正参加马来亚政治斗争是50年代初期的事。为了利用华人优势击败独立党，巫统地方组织在1952年吉隆坡立法议员的选举中，与马华公会当地的基层组组结盟，结果战绩辉煌。这种选举同盟继续在各地选举中推广，到1953年，两党终于正式结成联盟党，为马来亚的独立并肩战斗。尽管殖民当局利用各种方式打击马华公会，如纵容拿督翁攻击华人，采纳独立党议员的提案，取消马华公会卖彩票征集经费的权利等等。但马华公会还是不可遏制地发展壮大。作为联盟党的一员，它在以后的各种政治斗争中与巫统统一行动，如主张早日进行中央立法会议成员选举，组织抗议、示威，反对不合理的选举方案，并从各级委员会中撤走马华公会成员以示抵制，进而积极参加1955年的全国选举，和巫统一起作为执政党迎来了1957年马来亚的独立，在马来亚独立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马华公会的主要领导人是海峡华英人协会、马来亚国民党和华人商会的领袖，如陈祯禄、李孝式等。上层领导多数是在中央一级立法和行政会议任职的土生、富有或专业化的西化华人，中层领导多数是在各州市镇一级会议任职的土生或新来的中层富商。这两种人由于可以捐款办教育，维持各种社会福利活动而有效地控制了华人社会中各行业、各阶层的传统协会。下层领导人则是更低一级会议议员，各种传统协会的头头及小商人，通过他们动员了本协会成员参加马华公会。因此，马华公会是一个很有群众基础的政党，成员包括工商农渔学等各行业各阶层的华人，1953年约25万人，1957年达30万人。^③它的参预政治，反映了马来亚华人与马来亚政治的紧密联系。

综上所述，和战前政治活动的外向及封闭性质不同，战后马来亚华人主要是投身到马来亚的政治旋涡中，并与各族人民联合斗争，其政治活动已具备内向和开放性。

二

马来亚华人政治由战前的外向型、封闭型转变为战后的内向型和开放型，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由战后初期马来亚国内外形势所决定的。

(一) 马来亚华人社会从流动性转变为稳定性是华人对当地政治从漠不关心转变为休戚与共的前提条件。

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马来亚华人社会流动性很强。尽管30年代初，华人已相当多，但土生华人只有38万左右，仅占华人总数的29.9%，男女比例为1000:486。^④绝大部分华人只图赚了钱就返家发展，并不打算把马来亚作为永久居留地，所以出入频率很密。华人社会的这种流动性，决定了华人对一个临时居留点的政治发展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态度同时又是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的结果。英国殖民者在政治上保证马来人的特权而严格限制华人的政治权益，但在经济上则为华人创造发展的有利条件。而且，早期马来亚经济正处在繁荣时期，华人的生存和发展尚未受到严重威胁，用不着用政治手段来维持经济优

势。在这种情况下，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华人很自然地能够默认当时的政治现状，参与身之所在的当地政治尚未成为燃眉之急，而把政治热情倾注于心之所系的故土。

然而，30年代开始，这种流动社会却日趋稳定。直到1929年为止，马来亚一直准许自由移民，华人来去往复极为方便。但30年代初，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马来亚失业人口突然增多，政府对移民也相应采取限制措施，严格控制男性移民入境，^⑤马来亚大部分华人因此不敢轻易离马，而是逐渐接妻儿到马建立稳定的家庭。三四十年代中国战乱频频，也使以往以中国为归宿的华人裹足不前。马来亚华人社会终于从一个流动的移民社会转化为一个稳定的移民社会，大多数华人已视马来亚为永久居留地。1947年马来亚联合邦华人的男女比例为1000:815，土生华人约119.6万，占华人总数(约188.5万)的63.5%^⑥。他们大部分是30年代出生的，战争结束时已是青年人，战争的锻炼和各种新思想的熏陶，使他们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并充满自信。他们认为马来亚是自己的永久居留地，再也不能象父辈那样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和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生活，随时准备为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奋争。同时，他们既然打算在马来亚长期居住下去，必然也会关心居留地的政治前途。

(二) 民族之间的接触频繁与磨擦日增，直接促成华人卷入政治。

战前华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不与当地民族接触的独立社会。行政上，华人社会游离于马来亚各级行政管理之外，殖民当局主要靠早期的甲必丹制度和后来的华人护卫司署来管理华人；经济上，华人主要从事锡业、橡胶业、凤梨业、零售业及开办工厂，与经济活动被殖民当局限制在粮食生产及渔业的马来人接触不多；宗教上，华人主要信奉佛教道教，马来人信奉回教，回教的封闭排外性使双方难以融合；地域上，华人主要居住在西海岸一带的城镇里，马来人主要居住在东海岸一带的乡间。因此，在行政、经济，乃至宗教、地域上，华人基本上与当地人民隔离，可以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生活方式生活而对外界不闻不问。马来人社会也没有因社会的变迁遭到重大的冲击，他们按回教的习俗生活，在农村，乐于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迁入城市，又多能出任公职。马华两族基本相安无事，这是战前民族关系的主要特征。

然而，战前两族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毕竟在两族关系上投下了阴影，是日后逐渐加剧的民族矛盾的主要根源。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也极力挑拨马华矛盾，以马制华，利用以马来人为主的警察部队镇压以华人为主的游击队及抗日志士，这自然引起华人的强烈不满。英军重返马来亚前两周，控制着全马、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惩罚了大批通敌分子，其中有很多是马奸，这也引起马来人的误会。两族关系突然紧张起来，双方仇杀事件不断发生。殖民政府为了重建和巩固殖民统治，也大肆玩弄挑拨马华矛盾的伎俩，极大地挑起了民族的敏感和恐慌。部分华人害怕马来人通过政治机构来剥夺他们的经济优势，便比较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地位、实力和命运，希望通过参政，争得有利的政治条件以保护自己。也有不少华人察觉到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阴谋，意识到马华相争于己于国都不利，因此力主马华团结，为争取马来亚独立而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并获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这也说明，战后马来亚华人的政治发展固然是由马华民族矛盾加剧所促成，更是华人政治觉醒的生动体现。

马来亚华人社会的这些情况是比较特殊的。首先，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往往移民早，稳定快，许多人早就视自己为当地居民，因而早就关心和参与居留国的政治。他们

虽然也倾向祖国，声援国内的各种政治运动，但规模远远不及马来亚。

其次，马华两族在战前互相隔绝和相安无事的状况，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也不多见。这些国家的华人与当地居民互相通婚，杂处而居，行政统一，经济来往。但由于华人的经济优势往往影响了当地人或西人的利益，华人与他们的矛盾早就出现。这些国家当局或多或少都推行过种种歧视和迫害华人的政策，公民权之争在战前就已产生，民族冲突在战后也有所加剧，但并不象战后初期马来亚那样呈突发性。

此外，战后马来亚华人参与当地政治，也与英国殖民者对马来亚特殊的殖民政策有直接联系。战后东南亚各个宗主国中，美国1946年依约退出菲律宾，热衷于向菲律宾独立政权索取更多利益；荷兰、法国都直接向印尼、印支独立政权开战，直到战败被赶走，唯有老奸巨滑的英国，充分利用马来亚多元社会的特点，以种种政治手法使各族、各派势力互相争斗，相互牵制，从中渔利，维持殖民统治。^⑦这种特殊的殖民政策，既加深了马华的矛盾，也迫使华人不得不卷入政治斗争。

(三) 战争对马来亚华人政治态度的转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中国的内战，使马来亚华人与祖国的联系日益松弛，注意力逐渐转到马来亚本土来。中日战争爆发后，华人尽力声援中国抗日战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华人的抗日活动就与保卫马来亚紧密联系起来。日本南侵，使马来亚华人的命运与马来亚的存亡休戚相关，极大地激发了华人的政治热情。华人以各种形式毅然投身于保卫马来亚的斗争。马来亚陷落以后，日本侵略者视华人为最大仇敌，在马来亚三大种族中，华人所受苦难最为深重。华人由此也萌发了奋起抗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政治意识，成为抗日最坚决的中坚力量。

随着战后华人经济状况的恶化，华人的政治意识又有了进一步提高。战争结束时，马来亚经济崩溃，粮食奇缺，居住无所，通货膨胀，黑市猖獗，主要居住在城市华人比乡间马来人还要困苦，华人因此对当局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改善自己的地位。随着政局的剧变，华人在战争年代被激发起来的政治热情，也就很容易在政治家的鼓动下，继续高涨，越烧越旺。

(四) 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推动了马来亚华人政治觉悟的进一步提高，鼓舞了他们的斗争。

反法西斯战争锻炼了殖民地人民的民主与独立的思想意识，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成了战后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印尼、越南、菲律宾、缅甸相继赢得独立。马来亚华人的故土中国也终于结束了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于1949年建立了人民的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系列鼓舞人心的历史事件，无疑深深地教育了马来亚华人，极大地鼓舞着他们急起赶上历史的潮流，为马来亚的命运和前途，也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奋起斗争。

三

马来亚华人战后积极参与马来亚政治，无论对华人本身的政治地位，还是对马来亚的独立事业，以及马来亚未来的政治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 华人积极参与马来亚政治, 加速了马来亚独立的进程。

马共早期领导的群众运动, 对揭露殖民统治实质, 提高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 无疑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紧急状态”后, 马共虽然被迫转入地下, 但它的武装斗争, 极大地削弱殖民统治的力量。马共提出的为独立而战的号召深入人心。面对马共的严重挑战, 殖民政府才扶植其他政治组织, 并被迫作出种种让步, 于50年代初实行一系列宪政变化。其结果是马华两族合法政党越发强大, 自治独立呼声日高。马华公会虽然比较谨慎, 但最终还是站出来和巫统并肩作战。由于这一联盟使拥有20—30万会员的马华公会正式卷入马来亚政治, 还使因拿督翁分裂而衰弱的巫统重新兴旺(1953年成员达10万人)。⑧殖民当局骤然面临着一个强有力的对手。马华公会与巫统联盟表明马华两族政治上的团结, 使原来以民族分裂为由拒绝给予独立的殖民当局, 顿时失掉了借口。联盟推动了马来亚整个独立运动的高涨。各派政治力量由于马华公会与巫统的联合而重新组合, 并为争取人民的支持而竞相以独立为号召, 从而使民族独立运动突然飞跃发展。由此可见, 马华公会在战后马来亚政治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为直接从殖民者手里争得独立政权的执政党之一, 它对马来亚的历史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

(二) 华人参政, 是战后马来亚华人社会变迁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按照1946年1月殖民当局公布的马来亚联邦计划, 约83%华人可成为公民。⑨但1948年实行的联合邦宪法, 却规定了严格得多的公民权条件, 从而大大减少了华人成为马来亚公民的数额。到1950年, 只有50万华人成为公民, ⑩占华人总数约五分之一。然而, 在华人一系列政治斗争的压力下, 殖民政府被迫改变对华人的政策, 1952年提出修正的公民权条例, 条件略为放松, 据说50%—60%的华人有条件申请为公民。⑪到1953年, 115.7万华人成为马来亚公民, 还有43.3万华人是符合条件的。⑫之后, 马华公会与巫统并肩作战, 参加讨论独立宪法, 1957年马来亚独立宪法终于确认了华人一再争取的属地主义法则, 即生于联合邦者自动成为公民, 非生于本地的人申请公民权条件也很松。到此, 大部分华人已有条件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法律最终承认华人在马来亚长期定居的性质, 这为他们以后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政治创造了良好条件。

马来亚独立后, 华人参与当地政治已是势所必然。它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始终活跃在马来亚政坛上。战前马来亚华人社会与外界隔绝, 而当局完全忽视华人政治要求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战后到独立期间华人的积极参政则是这一历史变化的转折点, 在马来亚政治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注释:

① J.M.Gullick, "Malaya", London, 1964, P.245.

② Khong kim Hoong, "British Rule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in Malaya, 1945—1957",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75, P.239—240.

巴素著, 郭湘章译, 《东南亚之华侨》, 国立编译馆出版, 1974年, 第559页。

③ HENG PEK KOON, "The Social and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J·S·E·A·S. volume XIV, No.2, Sept., 1983, P.294—301.

④巴素前揭书, 第373、374、395页。

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变化略述

黄松赞

战后，特别是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及其后取得独立以来，新加坡华人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政治上国民化

国民化即当地化。第一，原来的中国侨民转变为新加坡国民。它标志着新加坡华人有了新的祖国，与当年母国的同胞从此成了不同国家的国民。这是新加坡华人社会随着新加坡的建国而出现的带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移民利益转变为国民利益。当年的移民，志在谋生，其利益与母国的兴衰关系至大。新加坡建国后，境内所有移民便同新国家结下兴衰存亡与共的关系。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往往成为华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第三，开始逐渐树立起新加坡国家意识（当地称为新加坡归属感或认同感）。华人一方面对中国的祖国观念逐渐淡化，落叶归根意念转变为落地生根意识。这在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和受英文教育的人中间表现尤为明显，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如对英国的了解，甚至抱

⑥巴素前揭书，第507—509页。殖民当局规定，1931年1—9月男性移民的法定额数是每月5,238人，10—12月是2,500人，以后逐步减少，1938年4月减为每月500人，直到马来亚论陷为止。但对妇孺移民则无限制。

⑦巴素前揭书，第373、374、395页。

⑧例如，用公民权问题挑拨马华两族矛盾，开始以放宽公民权的条件表示对华人的恩惠，继则以严格限制公民权的条件对马来人表示让步，经常召开种族代表会议，美其名解决种族矛盾，实则让各种族领袖面对面地争论不休，有意扶植巫统与马共抗衡，又支持成立马华公会以削弱巫统等等。

⑨Victor Purcell, "Malaya, Communist or free?" London, 1954 PP.104, 113.

⑩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一年二月初版，第95页。

⑪K. J. Ratnw, "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university of Singapour, 1965, P.84

⑫同⑩P.196.

⑬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0, P.92—93.